

·史海撷英·

影响顾廷龙先生学术生涯的几件事

王世伟

摘 要 顾廷龙先生弃理从文,为古籍版本目录学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沪创办合众图书馆;整理《尚书文字合编》;参予古籍版本鉴定,等等。参考文献 23。

关键词 顾廷龙 古籍版本 合众图书馆 图书馆教育 《尚书文字合编》

作为一代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的顾廷龙(1904~1998)先生,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几件事对其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一、弃理从文,为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顾廷龙先生 1904 年 11 月 10 日出生于苏州的

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顾祖庆是前清秀才,父亲顾元昌是一位教员,喜欢研究图书文物,书法功夫也很深。从 1908 年顾先生四岁起,即开始了读书学习的生涯,1933 年,顾先生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其具体的学习时间和学校见下表:

顾廷龙先生青少年时期求学读书一览表

1908 年 2 月—1915 年 1 月:	苏州家塾念书
1915 年 3 月—1918 年 6 月:	苏州私立彭氏小学后转入吴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念书
1918 年 7 月—1922 年 6 月:	苏州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念书
1922 年 7 月—1923 年 6 月:	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和上海惠灵英文专修学校补习英语
1924 年 7 月—1925 年 6 月:	上海南洋大学机械系念书,一年后退学
1925 年 7 月—1927 年 6 月:	上海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后转国文系念书
1927 年 7 月—1929 年 1 月:	担任家教并师从南翔叔祖父王同愈问金石目录学
1929 年 2 月—1931 年 6 月:	上海持志大学国学系念书
1931 年 7 月—1932 年 6 月:	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念书 ^[1]

顾先生早年在苏州的小学和中学求学念书。中学毕业后,为报考大学,曾先后在东吴大学 and 上海惠灵英文专修学校补习英语,并补习了数理课程,1923 年 6 月考取了南洋大学机械系。1925 年 5 月,上海日商纱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顾先生所在的南洋大学自然也不例外。秋后开学,顾先生对于数学物理并无太大兴趣,加上父母从将来寻谋职业方便考虑,希望他学习商业,于是他便转学到了刚刚成立的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实际上,顾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之所以转学,是因为他十分喜欢文字学,而章炳麟时任国民大学校长,学校中又有教授胡朴安,他们都是顾先生久慕的学者。顾先生进入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后,正课读的是商科科目,而选修

则选了几门文科;到了第二年注册时,选课全选了文科的课程,当时的商科经济系主任看了选课单,劝顾先生转系,这样,顾先生就从商科经济系转到了国文系。当时教授经学和文字学的是胡朴安,教授音韵学的是闻宥,教授诗歌的是胡怀琛,教授六朝文的是刘三,均为知名学者。在这些老师中,顾先生后来经常通信的有闻宥和容庚二人,顾先生认为:“这些人都是爱护图书文物的,他们对我的影响,又是巩固我终身从事这个事业的志愿。”^[2]正是因为如此,于是有了以后的从王同愈问学的经历,有了持志大学国文系的学习经历,有了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的学习经历,有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中文采访的经历,也有了离京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机遇,从而为以后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顾

先生早年的弃理从文是其一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

二、离京南下,在沪创办合众图书馆

三十年代末离京南下,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是顾廷龙先生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顾先生离京南下,分析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使素称藏书最丰富的东南一带遭受兵灾,藏家纷纷流散,而当时的公立图书馆均已迁往内地,上海虽有私立图书馆数处,但各有其方针,对于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兼顾不到,私人收购流散图书的也很少。目睹丰富的中华历史文献珍藏被日美等列强多方搜括以去,顾先生很觉痛心。诚如叶景葵在1939年4月3日给顾先生的信函中所述:“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3]

二是由于顾先生与叶景葵、张元济等先生有深厚的学术交往的基础。顾先生与叶景葵在1933年经由信函通讯相识。顾先生后来回忆:叶先生“是一个爱护后辈的长者,每到北京,必来看我。平时讨论金石目录之学,很相投契。”^[4]1939年3月15日,叶景葵在给顾先生的信函中谈及准备创办合众图书馆,并征求时在北京的顾先生是否有南图的意愿:“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南图否?”^[5]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先生的信函中更明确地提到了合众图书馆的组织设置等问题:“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6]对于叶景葵等人的盛情相邀,顾先生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7]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了顾先生极大的鼓舞与激励。这也是促使顾先生毅然南下的重要原因。

三是顾先生离去燕京之意甚切。关于这一点,过去在研究分析顾先生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文字中很少提及。顾先生于1932年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即留校继续从事研究,其间写成了《吴恂斋先生年谱》、《古陶文彙录》著作的初稿。1933年秋季,由顾颉刚介绍,顾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并兼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驻北京采访处主任,半日研究,半日工作。

当时的采访经费均由哈佛燕京学社拨给。他也承担了为哈佛购书的任务。尽管如此,顾先生担任采访处主任后,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关系,“一般地说都是他们指定的普通书,从没有主动地为他们搜罗过。”^[8]但也曾遇到过美方指定要购买善本书的例子。

一次是1938年9月美方指定要买一部宋杜大珪编的《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这是一部宋刻明补版的珍贵图书。此书系编录碑传文章,虽然当时国内收藏的还多,但顾先生认为属名贵罕见之书,一去之后,国内就少了一部。顾先生很不愿好书出国,于是和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商量能否复制,但无法筹资;顾先生又与引得编纂处的聂崇岐商议,欲全部重印,但所需经费太大,也有困难。后来不得已,就把其中不见他书的文章,汇印一书,后附引得,题为《琬琰集删存》。

另外一次是1938年12月,美方又指定要买几部清朝嘉庆道光间人的文集,均为稀见的文献。当时顾先生极力主张由图书馆重印,结果印成了五种,就是《愚庵小稿》、《许郑学庐文稿》、《梦陔堂文集》、《保甌斋文录》、《袖海楼杂著》。“这样,并没有把难得的原刻本搜罗送出。当时既担任这工作,自不能不听命采办;但看好书从我手中流出,心中总感不愿。因此,我离去之意甚切。”^[9]

正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使顾先生感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中文采访工作并不是他的期望,也并非是他最适合的工作。当叶景葵、张元济在上海发出南图的邀请时,顾先生即向燕京方面辞职。馆方虽挽留,但顾先生“去意已坚,终至离开。”^[10]

三、时隔三十多年,先后两次担任大学兼职教授,培养专业人才

顾先生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对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抗战胜利后,上海各大学先后复校,有的增设文学院,有的增加文史课程。当时顾先生的学术已为学界所公认,他也希望通过教学,“物色几位对国学有修养,对图书馆有兴趣的青年来共同工作。”^[11]1947年7月,同济大学成立国文学系,郭绍虞为主任,聘任顾先生为兼任讲师,担任读书指导。1947年9月,孙人和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聘任顾先生为历史系兼任教授,担任史部目录学和金石学的教学。1948年7月,时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蒋维乔聘任顾先生担任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担任文字学的教学。顾先生在培养文史和图书馆人才方面发挥了其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作用。

时隔三十多年之后的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创办不久,当时担任系主任的陈誉教授开门办学,先后聘任了顾廷龙、潘景郑、胡道静、吕贞白等著名学者担任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导师,继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之后,较早地在全国高校图书馆系中开始进行研究生的培养。顾先生从1980年起的十年中,先后担任了三届的研究生导师,培养了周松龄、邱健群、王世伟、彭伟国等多名研究生,还为研究生开设了“校勘学”等课程。顾先生还应聘担任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培养了梅宪华、日本学生高桥智等在内的多名研究生。1981年,顾先生在《整理出版古籍小议》一文中,谈到了古籍专业人员的培养。他认为:“大学应设古典文献学系,创设研究所,将素有研究者组织起来。大学生或研究生都必须有一定的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的基本功。将来各专一经,分别研究。”^[12]

顾先生在时隔三十多年的前后,先后两次担任大学兼职教授培养专业人才,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经历,使先生渊博的学识在教育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从而为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培养了人才。

四、古文字学的兴趣和基础与《尚书文字合编》的终身追求

顾先生早年就对古文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如他早年从南洋大学机械系转入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后入国文系),正是由于“自己喜欢文字学,久慕章炳麟及教授胡朴安的学问”。^[13]在从叔父王同愈学习的过程中,有机会阅读了王同愈有关金石、目录、书法、绘画的藏书,而顾先生“所喜欢的也就是这些”。^[14]顾先生回忆:“我决定一面启蒙,一面还从王同愈学习。两年中,我阅读了不少有关金石目录的书籍,汇录了各家批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传本,又汇录了各家阅读《积古斋钟鼎款识》的校语。在这两项工作上,对我专业的修养,提高了不少,建立了我治学的基础。”^[15]顾先生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导师为容庚。容庚正是当时古文字学最负盛名的学者。燕京大学就读期间,顾先生曾住在族侄顾颉刚家里,而顾先生“爱好文物,爱好考据工作,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16]后来顾先生所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说文废字废义考》,正是研究古文字学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后,顾先生曾撰写了《吴斋斋年谱》和《古陶文彙录》两部著作的初稿,这两部著作研究的内容也都是古文字学的或与古文字学有关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顾先生曾举荐华东师范大学李玲璞教授担任《古文字诂林》项目的主编,自己也应聘担任了该项目的顾问。1995

年5月26日,顾先生在给笔者的来函中谈到了《古文字诂林》和异体字问题:“《古文字诂林》进行有无困难?我颇感异体字问题很有研究。但须吃饱饭,没有任务,才能为之。我有条件,而老不中用耳。——唉!”^[17]联想到顾先生在指导我研究生论文时,初定的论文题目就是《敦煌文献的别体字研究》,可见顾先生对于文字学特别是异体字问题多有心得,原本是可以作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的。

正是由于顾先生对于古文字的浓厚兴趣与扎实的研究基础,所以与《尚书文字合编》结下了不解之缘。顾先生1933年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由顾颉刚介绍担任了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1934年加入了顾颉刚组织的禹贡学会。1939年11月,顾颉刚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聘任顾先生为名誉研究员。叔侄两人可谓很有学术缘分,而这种学术缘分突出地表现在《尚书文字合编》一书中。顾颉刚对于《尚书》之学深有研究,当年曾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学,因有编辑《尚书学》之计划,因以《尚书文字合编》属顾先生相助,顾先生欣然答应。顾先生1992年在《尚书文字合编版刻样本跋》中回忆了当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以及研究整理《尚书文字合编》时的情景:“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授《尚书》学,感于《尚书》一经文字之纠纷最多,欲剖析是非,必先取各种古本,加以比勘始可。于是搜集不同载体、不同字体之本若干种,将以汇编付印以备研究。……因思仍以刻版为佳,影写上木,当时尚有青年高手,藉此一编,并可使雕版之业流传有绪。颉刚与余商酌既定,遂由北京文楷斋承梓,……费时八年,将近完工,不意卢沟桥事变起,北平沦陷,此事暂告停顿。1939年夏,余携家赴沪,安顿后,继续写刻,但未及全部毕工,而文楷歇业,刻工星散。所有版片……解放后运来上海图书馆。历经周折,忽忽六十年矣。”^[18]顾先生在《尚书文字合编后记》中也谈及了多年未能完成的原由:“1980年余奉命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来京,顾先生(指顾颉刚)又以《尚书文字合编》工作相促,余无以应,内疚无地。未几先生以心脏病去世,殊感痛悼!”^[19]1982年起,在有关方面的鼓励和支持下,顾先生又开始将未竟之稿予以完成。1995年2月19日,顾先生在给笔者的来函中曾提到:“我于《尚书文字合编》尚未完全脱手,本月内必可结束。李玲璞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与王元化先生合作)向国家古籍规划小组请到补助,出版将无问题矣。”^[20]几个月之后,即1995年8月,《尚书文字合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出版前言中,顾先生对先秦《尚书》的面貌、西汉的今古文、东汉的科斗古文、东晋的隶古定、唐代的今字和异体字、五

代的科斗古文和宋代的隶古定等分别进行了考证。诚如顾颉刚所言:“经学中今古文问题以《尚书》为最复杂,加以字体传讹弥多,遂至纷乱而不可理董。”^[21]至此,顾先生受顾颉刚之托而于终身所追求的《尚书》文字的学术难题,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五、多次参加文物鉴定整理工作,成博学多闻的古籍版本鉴定大师

顾先生于历史文献中的唐写本、宋元明清刻本、明清尺牍、抄校稿本、碑帖书画、近现代革命文献等均有所研究,文献鉴定的识见为海内外学界所叹服。顾先生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与他多次参加文物鉴定整理工作是分不开的。顾先生一生的工作机构,主要有三处,一是燕京大学图书馆,二是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三是上海图书馆,而精力尤其集中在后两处。由于对图书文献很爱好,所以数十年中从事图书文献事业可谓乐此不疲,而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在数十年图书文献的生涯中,顾先生多次参加文物鉴定整理工作,有机会目验鉴定众多图书文物,成为古籍版本目录学家。

首先是合众图书馆创办的前几年中,顾先生与各方面接触,尽力进行图书文物的收集与保护工作,曾接受了众多藏书家捐赠的大批专门收藏,奠定了当时合众图书馆藏书的基础。在这几年中,顾先生杜门检理,罕与外接,编制草卡,编写善本书志,选印有关书画考古的未刊资料16种。^[22]

其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合众图书馆曾接受了各家大量的赠书,特别是许多老辈学者和藏家把自己和前人的著作稿本,郑重地送来合众图书馆保存。顾先生模仿天一阁的遗法,不放松当时各种刊物的搜集,或直接去信,或辗转托人,以供后来考史之用。

第三是1946年3月,徐森玉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代表,成立了办事处,聘任顾先生担任了总干事。这个办事处的任务,是要向日本索回历年搜括去的文物做好准备工作,主要是编一个“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当时一起参加工作的有贺昌群(解放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谢辰生(解放后在文化部文物局工作)、程天赋(解放后在上海高等教育局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办事处处理接受下来的汪伪政权陈群的藏书数量甚多,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国民党军统手里接过来的。因此,为了郑重起见,当时

另外成立了一个上海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由国民党教育部另外聘任叶恭绰为主任委员,顾先生与徐森玉、郑振铎、马叙伦、王庸为委员。后来这批书分给了几所大学。当时贵州大学分到了一批,在一捆杂书中间,夹有很多的革命文献,大学的人员并不检看,就决定不要,准备卖给收废纸的。顾先生即与贵州大学校长商量,不要毁掉这些革命文献,希望转送给合众图书馆,而合众图书馆又把自印整齐的书送给贵州大学作为交换。这样,五十多种革命文献得以保存。^[23]

第四是1947年,办事处结束后,获悉国民党军统所管理的敌伪产业处理局中所接受的文物很多,徐森玉等深恐这些文物被分散或盗卖,想能看看其中有哪些珍宝。1947年4月,成立了国民党行政院接受敌伪逆文物审查委员会,徐森玉为主任委员,顾先生兼任了编纂,协助鉴定工作。

建国以后,顾先生于五十年代末担任了《中国丛书综录》的主编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过抄家文献的整理工作,从1978年起又担任了历时二十年之久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编工作,这些都为顾先生的古籍版本鉴定提供了很好的“观风望气”的条件。

参考文献

- 1、2、4、7、8、9、10、11、13、14、15、16、22、23 顾廷龙自传,1956
 - 3 《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便笺)》三十四.载《历史文献》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 5 《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便笺)》三十一.载《历史文献》第1辑
 - 6 《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便笺)》三十五.载《历史文献》第1辑
 - 12 顾廷龙.整理出版古籍小议.载: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 17 1995年5月26日顾廷龙致王世伟函
 - 18 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版刻样本跋.载:顾廷龙文集
 - 19 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后记.载:顾廷龙文集
 - 20 1995年2月19日顾廷龙致王世伟函
 - 21 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前言.载:顾廷龙文集
- (王世伟 教授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收稿日期:2005-11-17)